

30



海南省儋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儋州文史

第六辑

附

第1-5期



儋州文史

第六辑

海南省儋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

EA63/49
《儋州文史》编辑委员会

顾问：陈士光 黎圣三

主任：李昌祥

副主任：罗名俊 卓汉然

主编：韩国强

副主编：谢有造 钟守甫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）

丁孟威 邓大胜 刘胜道 陈扬文

李昌祥 吴绍里 卓汉然 罗名俊

黄玉香 谢有造 谢良翥 韩国强

本辑审稿：李昌祥 韩国强 谢有造 钟守甫

封面题字：于迅

封面设计：邓大胜

封面摄影：刘胜道

目 录

郭沫若在儋州.....	韩国强(1)
迈步崎路 受命危难时	
——李汉在儋县革命生涯片断(二) ...	黄兹信(12)
排浦乡建党抗日反顽斗争片断	叶连芳(29)
惨绝人寰 罪恶滔天	
——日军血洗和合村始末 ...	钟守甫 梁春田(36)
儋耳、珠崖名称由来质疑.....	范会俊(41)
儋州语言述略	何统川(50)
客家人渡琼居儋史略	钟守甫 梁春田(57)
歌海溯源	张锦寿(67)
儋州古井知多少	谢有造(75)
蓝洋温泉——旅游的胜地	陈小川(79)
从古儋义到东坡小学	谢良鼎(83)
抗战时期的琼西联合中学	王 焕(91)
前进中的儋州市那大二中	李才栋(95)
科研结硕果、教育塑英才	
——原华南热作两院创业纪实 ...	两院宣传部(99)
我市中小学教师工资变革史.....	廖以生(109)
邓春华将军传略.....	谢有造 邓崇勇(129)
我与养吾先生.....	王 焕(133)

教鞭手执驰中外

——忆万僖先生…………… 林壮标(139)

少小离家老大回

——我与王焕先生的忘年交…………… 陈国梁(144)

胡松与石屋…………… 宋 梅(148)

麦万村杨三公与海岸桥…………… 梁春田(152)

学村的敬字亭…………… 何统川(154)

儋州历代科举及第文章选登(二)…………… 谢有造(156)

旅台王彦先生答源山表侄…………… 廖以生(161)

附:《儋州文史资料》第一辑至第五辑编目 … (163)

郭沫若在儋州

韩国强

郭沫若曾两次到儋州，第一次是1961年3月3日至6日，第二次是1962年2月9日至11日。郭沫若在儋州游览名胜，结交朋友，点校志书，考证地名，著书立说，在民间留下不少佳话。

一、点校《儋县志》

《儋县志》是海南地方志保存最完善的县志之一，《儋县志》始修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（公元1613年），原名为《儋州志》。民国二十三年（公元1934年）最后一次重修时改名为《儋县志》。《儋县志》全书共18卷，约56万字。郭沫若点校的《儋县志》是海口海南书局代印的木刻本。

郭沫若点校《儋县志》是他在海南重要的学术活动。此事鲜为人知。较全面反映郭沫若在海南活动的《郭沫若海南诗文注》（陈波、陈海编著）一书也只字未提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。

郭沫若点校《儋县志》共5卷，主要是《艺文

志》，包括《苏文忠公居儋录》第10卷至第13卷，和《艺术志·诗》第14卷。

（一）加标点，诗：219首，其中东坡诗166首，他人诗53首；文：122篇，其中东坡文99篇，东坡言行22篇，古迹1篇。

（二）校勘7处，都是东坡诗文，其中诗4处，文3处。如，《儋耳山》“君看道旁者”的“者”，校正为“石”；《行琼儋间，肩舆坐睡……》“我行西南隅，知度月半弓”的“南”和“知”，分别校正“北”和“如”；《夜烧松明火》“客含凄薄寒”的“含”校正为“舍”；《与张逢六首》“今”渠获一定居的“今”校正为“令”；《与秦少游二首》的“秦”校正为“秦”。有疑点的有3处：《与范元长八首》“而告友翰林”的“告”，疑为“老”（笔者按，查《苏轼文集》，“告”应为“吾”。）；《与秦少游二首》“许久”的“久”疑为“珏”（笔者按，“久”，《苏轼文集》作“九”，许九，即许珏。）；《和拟古九首》“犀渠破余疑的“渠”，疑为“杖”（笔者按，《苏轼诗集》仍为“渠”。）

（三）眉批共112条，其中批诗58条，批文54条。眉批大体分为四类：评价、校评、疑问、摘录。

评价：《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》批：“关心教育”。《五色雀并序》批：“关心农民”。《和答庞参军三送张中》批：“张中亦怀才不遇者”。《和

拟古九首》批：“黎民矣，对轼甚好，送布”。《书海南风土》批：“海南长寿者多”，《与范元长八首》批：“不敢写文章”。《五指山》（邱浚）批：“五指山好诗”。等等。

校评：《行琼儋间，肩輿坐睡……》批：“茫茫太苍中一句好”。《和杂诗十一首》批：“好：余生幸无愧”。《儋耳山》批：“应以石为好”。《欧阳晦夫遗接鬲琴枕，戏作此诗谢之》批：“应是去合浦之作”。等等。

疑问：《和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批：“黎子云可能是黎族”。《益智子说》批：“何谓益智”。《苍耳草说》批：“何谓苍耳”。《与林济甫二首》批：“林济甫何人”（笔者按，林济甫之“林”，《苏诗总案》作“杨”。杨济甫，眉山人，东坡故乡的近邻。东坡和子由外出，其眉山故居由杨济甫代管。）等等。

摘录：如，“丈夫贵出世，功名岂人杰”、“诗人如布谷，聒聒常自鸣”、“南来万里真良图”、“垂死初闻道，平生误信书”、“九死南荒吾不恨”，等等。

（四）加着重号，172处，其中有7处全诗加着重号。

郭沫若点校《儋县志》没有写明时间，估计可能是在第二次来儋州的时候。郭沫若第一次来儋州视察了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和西联农场，不可能完成这样大量的工作。第二次来儋州写作了《儋耳行》，

到广州后又写作《说儋耳》，明显这是在认真阅读《儋县志》后才诱发了创作的灵感。再说，《儋耳行》“黄子木杖手斜拖”句出自《居儋录》《以黄子木杖为子由生日之寿》。郭沫若在《儋县志》批：“黄子木杖，我有一枝。”这也是郭沫若点校《儋县志》应是第二次来儋州时的明证。

《儋县志》的《居儋录》有许多作品并非东坡居儋时作。由于条件的限制，郭沫若在点校《儋县志》时，除了指出《欧阳晦夫遗接~~鸢~~琴枕，戏作此诗谢之》是去合浦之作外，非居儋作品，其余未能一一指出。这也算一点遗憾。

二、对“儋耳”的考证

郭沫若两次视察儋州，对此地的人文景观发生极大的兴趣。第二次离开儋州后，在广州逗留期间，写作《说儋耳》一文，发表于1961年4月11日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
儋州古称儋耳。据明代《正德琼台志》记载：“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平南越，明年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置朱崖、儋耳二郡。”儋州作为行政区域这时才正式在西汉史册中出现。

据郭沫若考证，远在西汉元封元年之前，儋耳之名已见诸史书。郭沫若至少有三次著文考证儋耳。

第一次，《访那大》诗注中首先公开提出：“儋耳之名已见《吕氏春秋·任数》。第二次，《儋耳行》诗序中又说：“儋耳之名初见《吕氏春秋》，即今海南岛儋县。”第三次，《说儋耳》校正了《吕氏春秋》的笔误，阐述自己的见解。

关于儋耳的解释，目前有二：其一，《山海经》云：“南荒之外，有离耳国，其人耳长及肩，每逆风走，则将耳反搭于上，使不窝风。”晋初，郭璞《山海经注》“镂离其耳，分令下垂以为饰，即儋耳也。”《异物志》又说：“儋耳之云，镂其皮，上连耳匡，分为数支，状似鸡肠，累耳下垂。”

其二，郭沫若在《说儋耳》的说法。郭沫若的文章有三层意思：一是郭沫若认为“儋耳可省言为儋，则耳殆语助，有音无义，故儋耳并非垂大之耳。”二是郭沫若认为《吕氏春秋》“北怀儋耳”的提法有误。“东至开梧，南抚多颡，西服寿靡，北怀儋耳”，应为“南抚儋耳，……北怀多颡”，或“北抚多颡，……南怀儋耳。”根据是：①“所谓‘多颡’者，颡同瘰，乃甲状腺肿。病源由于缺乏碘质。此种病症，北方多有之，因离海太远，缺乏富于碘质的海带以供食用。……故‘多颡’之国应在北方，而儋耳则即海南之儋耳。”②《山海经·太荒北经》说：“儋耳之国在大荒北，任姓，禺号子，食谷，北海之渚中。”郭沫若认为“食谷”即可证明儋耳是在海南

岛。”“任音古读 [Rem]，与儋音相近，同为收唇音。又黎人称其先为黎母，实即任字之缓音。盖促言之为任，缓言之则为黎母。”三是，郭沫若认为“离耳亦即黎母。”

郭沫若校正了《吕氏春秋》关于儋耳方位的错误，否定了两个儋耳的提法，把儋耳见诸史书的时间提前了一百多年。这无疑是郭沫若在儋州学术研究的重大成果。

三、赋诗解难题

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是否到过儋州的白马井镇呢？学术界有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。

《东汉会要》认为马援将军南下征讨，沿海岸线进击，未到过海南。明代名士王佐在《平黎记》也说：“后伏波新息侯，特以隔海立县，招扶功，未尝一卒渡海。”

马伏波是否率师挥戈渡海，登临海南，史书似乎没有明确记载。倒是儋州民间却有马伏波登陆白马井的种种传说。作为一个学术问题，传说当然缺乏说服力。

郭沫若视察白马井时，从古音学上的道理，说明了白马井名字的由来，证实伏波确实来白马井。他在《白马井港》（四首）说：“古今音变字传讹，白马应知即伏波。”诗序中又说：“传说伏波将军来此

时，有马蹴地得泉，凿井因名‘白马’。此望文生训之说耳。实则白马即是伏波，古无轻唇音，伏读如白，波马音亦相近。由此古音，可断定伏波将军确曾前来儋耳。”但是，郭沫若接着说：“唯不知系路伏波抑马伏波耳。……东坡生于九百余年前，已难‘定于一’，今则更难定矣。”

郭沫若在儋州，从古音研究入手，解决学术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，这件事反映了郭沫若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。

四、访中和

1962年2月10日，郭沫若到中和，考察了苏东坡在儋州的遗迹——东坡书院、桄榔庵和东坡井。

当时，东坡书院已破旧，但载酒亭、载酒堂和大殿保留基本完好。看管东坡书院的周士生向郭沫若一一作了介绍。郭沫若仔细地观看了碑文和坡仙笠屐图，诗情涌动，浮想联翩。他仿佛看到苏东坡面带笑容，缓步走来，两位不同时代的大文豪亲切地侃起来，古代大文豪问峨眉山月，当代大文豪畅谈祖国的变化。古代大文豪似解似非解，仍说四大皆空……郭沫若把这些感受当日写成长诗《儋耳行》。此诗发表在1962年3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
郭沫若与周士生一路谈笑风生。郭沫若走在石板街上，被古老的建筑和淳朴的民风吸引，一切都

感到新鲜。他看到一些小摊摆卖土产品，便好奇地走过去，看一看，问一问。一群天真的孩子在街道踢毽子，郭沫若见了，停下来观看，他捡起毽子，踢了几下，逗得孩子们笑起来。周士生跟我谈过这件事，深有感触地说，郭沫若身为大名鼎鼎的文学家，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但没有一点架子。

郭沫若来到桃榔庵。当年，苏东坡被驱逐官舍，盖桃榔庵栖身。郭沫若来时，桃榔庵已废，遗址盖起小学。“今为小学易以砖，白堊遥望光昭鲜。”郭沫若考察桃榔庵遗址，只留下这些印象。

苏东坡谪居儋州时，为了改变当地人饮不干净河水的习惯，亲手挖了东坡井。经历了八百多年桶底的磕击，井口的石栏已出现凹痕。郭沫若一行步阡陌，穿竹林，来到东坡井。周士生告诉郭沫若，现在当地群众还饮用此井水。郭沫若听了，非常激动，在井边徘徊很久。他默默地奉起一瓢井水喝起来。由此可见，郭沫若对苏东坡多么情深意厚啊！

郭沫若访中和成了当时的新闻。《南方日报》记者徐续闻讯赴中和，采写《访儋县苏东坡遗迹》，向社会介绍了郭沫若访中和的细节。

五、与周士生的友情

郭沫若在《儋耳行》诗序中说：“向导周叟，无需中介，可以彼此对答。”这位周叟，就是当时看管

东坡书院的周士生。

周士生是中和的文化人。他熟悉儋州历史掌故，喜欢吟诗作对。他有个癖好：嗜酒。当地人称他“酒爷”。

郭沫若到中和，寻访东坡踪迹，由周士生作向导，他们互问年庚，当郭沫若得知周士生比他年长两个月时，便称周士生为“周兄”。当时两位老人年纪已七十，一见如故，无拘无束，畅所欲言。考察结束时，两位老人好像话还没有说完。郭沫若告诉周士生，回京后，一定给他写信。

《儋耳行》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后，不久，周士生果然收到郭沫若的来信。郭沫若在信中感谢周士生的接待，告诉他《儋耳行》已在报上发表。周士生非常高兴，郑重其事地将这封信和信封一起装在玻璃镜框里，挂于居室。周士生也给郭沫若回了信，并赋诗赠送。后来，周士生还将一包中和的特产“荷包豆”寄给郭沫若品尝。“文革”时，慑于形势变化，周士生的家属把郭沫若的信藏起来。

1963年5月，我回乡为祖母奔丧。周士生协助我家办理丧事，常常跟我谈到郭沫若在儋州的事。他钦佩郭沫若，当场一字不落地默写下郭沫若《访那大》。这些手迹，我珍藏至今，作为郭沫若与周士生友谊的佐证。

郭沫若与周士生的特殊往来，被新闻界发觉后，

记者追踪采访。徐续在《访儋县苏东坡遗迹》写道：“第二天清早，周士生就来了。他带来一帙手稿，里面有郭沫若自北京寄来的书信，还有他寄赠郭老的旧体诗，其中有‘稀度喜逢人健在，不期车笠偶相符’的句子。”徐续在《东坡话·狗仔花及其他》一文把郭沫若与周士生的结交，跟郭沫若与萝冈洞钟踏梅结交相提并论，誉为文坛美事。

六、一首诗的谜

郭沫若在儋州作诗凡9首，其中有一首诗的写作对象却成为一个谜。其诗如下：

东坡居士曾居此，朝夕常思返蜀山。
深幸我来千载后，欣看质变数年间。
胶源浩荡森林海，香韵芬芳极乐园。
三面红旗照耀下，天涯无处不奇观。

此诗的手迹勒石树立于中和东坡书院，没有题目，落款日期为1961年3月3日。此诗最初发表于1961年4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，是《海南纪行》组诗中的一首，即《访那大》之二。诗发表时有三处改动：颌联“欣看”改为“惊看”，颈联“胶源”改为“富源”，尾联“照耀下”改为“辉耀处”。当年，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，曾议论此诗，认为苏东坡没有到过那大，“东坡居士曾居此”一句失实。一个朋友曾就此事写信给人民日报社。后来，人民日报社复

信说，信已转郭沫若。郭沫若将，此诗又一次发表在《南方日报》（1962年2月25日）上，题目改作《题海口东坡祠》，写作日期修订为1962年2月11日。这次发表有四处改动：第一句改为“东坡流谪曾来此”，颌联“我来千载后”，改为“我生千载后”，颈联“香韵”改为“花卉”，尾联“辉耀处”改为“昭远域”。

郭沫若为什么把这首诗题目改动呢？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：

（一）郭沫若已觉察《访那大》题目不妥，采纳了读者意见。

（二）当时儋州东坡书院多年失修，没有海口东坡祠影响大。

这首诗题目的改动，表现郭沫若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。

1981年12月，儋县文化馆编印的《苏东坡在海南》和1993年3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苏东坡在海南岛》（朱玉书著）的插页，在此诗手迹加注：“郭沫若同志为东坡书院题诗手迹。”我们了解了郭沫若在儋州的活动，不难发现这条注是作者望文生义，想当然而加的。

1994年4月16日—24日

作者韩国强，儋州市中和镇人，作家，现任儋州市文化体育局局长

迈步崎岖路 受命危难时

——李汉在儋县革命生涯片断（中）

黄兹信

为抗日救亡奔忙

1936年12月“西安事变”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联共抗日，因而国内战争转为抗日民族战争。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的方针，儋县县委切实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。

身为县委书记的李汉，主要的时间已经不是在县委机关所在地峨蔓，而是在县城新州，有时也到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比较出色的新英、白马井、海头、长坡、木棠、光村等墟镇。新州的月丰理发店和大众书店，是县委的地下联络站，领导人分别是吴炬和吴浪渡。这两个地方也是李汉和县委同志到县城活动的据点。李汉每次到来，刚一歇脚，就通知吴炬、吴浪渡和儋县中学党支部书记谢凤安等同志，前来汇报、研究工作；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人来向县委